

艾登回忆录

全译本

上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艾 登 回 忆 录

(全 譯 本)

安东尼·艾登著

书报簡訊社譯

上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年 · 北京

出版者的話

艾登长期以来是英国統治集团內的重要决策人之一。他从1935年起先后在英內閣任职約二十年，其中任外交大臣十年，任首相近两年。这部回忆录所涉及的主要是他从1951年再次出任外交大臣，到1957年侵埃失敗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为止，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會議。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写艾登再次出任外交大臣期間（1951年10月到1955年3月）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其中主要包括朝鮮停战問題、印度支那战争問題、重新武装西德問題、伊朗石油問題、埃及政局以及柏林會議和日內瓦會議。第二卷写1955年4月艾登担任首相以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和重要的外交活动。例如經濟問題、国防問題、殖民地問題、約旦問題、最高級會議、艾登訪美以及布尔加宁和赫魯曉夫訪英等。第三卷則全部写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經過以及英美在这个問題上的尖銳矛盾和斗争。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中，国际力量的对比发

生了进一步有利于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力量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际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增长，世界各国的和平力量继续壮大，而帝国主义国家则矛盾重重，不断发生经济、政治危机。客观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

这部回忆录突出地暴露了英美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的深刻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美国曾千方百计想拖英国下水，企图在印度支那取代法国地位，并进而渗入英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在伊朗石油问题上，美国也曾利用伊朗人民的反英斗争挤进英国侵略势力的地盘。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英国武装侵埃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英国想借助美国力量迫使纳赛尔就范反而被美国推下泥潭，最后“艾森豪威尔主义”进入中东的过程。这些事例生动地暴露了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勾心斗角和明争暗斗，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大鱼吃小鱼的无可奈何的招供。

回忆录中也流露了英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

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仇恨和敌视。艾登虽然饱尝美帝国主义挖墙脚的滋味，虽然最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空前的羞辱和难堪的下场，但是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还是寄望于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合作无间”，以便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民主运动，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这就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本性是不会改变也永不可能改变的。

帝国主义之间，由于其侵略和掠夺的本性，一方面在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镇压民族民主运动方面有着基本上一致的一面，另一方面在争夺殖民地和维护其本身利益方面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的联盟是“强盗的联盟”。这部回忆录正是列宁这句名言的最好的注脚。同时，帝国主义由于其本性不变，尽管遭到越来越惨重的失败，还是要继续捣乱。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曾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部回忆录也正是这一英明论断的有力的证明。

像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僕杜勒斯一样，艾登也是一个坚决的帝国主

义者，也是一个反面教員。他的回忆录是一本反面教材，值得我們看看，从而更深刻地認識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本书中反映出来的它們之間的矛盾，进一步加強我們反帝的革命斗志。

这部回忆录曾于1960年1月11日至2月1日在倫敦“泰晤士报”长篇摘要連載，我們为了及时提供有关方面参考，3月間譯出該报摘要，出版了节譯本。現再出版全譯本，供各級領導同志及宣傳、理論和外事工作者参考。

为了保留原书的面貌和便于閱讀，这个譯本完全按照原著的全文本譯出，几幅地图也是照原图复制的，原著中的注釋一律保留，并增加了少数譯注。

1960年12月

前 言

1957年春动完手术以后，我就想写一本书，谈谈我担任公职的几年中的一些事情。我本来打算按照众所公认的时序来写——就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直写到目前。

这种写法的好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训以及这些教训在五十年代的应用，都能够比较容易地显示出来，而把这些教训应用到五十年代，正是我的回忆录的主题。不过，这种做法却带来一种限制，而我认为这种限制是非常严重的。这样写法，至少要过四年以后，我才能谈到比较近期的事情。我认为我不应该等待这样久。这本书将暴露一些创伤；这样做将有助于我们医治这些创伤。

我负责处理我国外交政策的年代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5年到1945年，其中，从1938年2月直到次年秋初的十八个月，有一段中断，原因是我辞去了张伯伦先生政府中的职位。9月3日大战爆发，我随同丘吉尔先生再度回到

內閣，并在 1940 年底再度出任外交大臣。

第二个阶段，是从 1951 年秋到 1957 年 1 月，在这一段时期中，我不是担任外交大臣，就是出任首相。这部书所要叙述的，就是后一阶段，但是我在这一阶段所主張和奉行的政策，却是以我早期的經驗为基础的。在推行这些政策时，我发现我常常在意見上同我国以及盟国的一些人不一致。这一直是我感到遺憾的一个原因。

我这一生的許多時間都用在指导或执行外交政策上，因此我感到，我應該把这些事件按照我的看法写下来。我在这部书中写下的許多意見和种种决定，都是我在当时作出的。我希望我这段叙述、我的推論以及我的經驗，对別人能有所裨益。

我所使用的材料包括我写的一些私人备忘录，这些备忘录是我担任外交大臣时常常提供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我担任首相时提供其他同僚参考的。所用材料的另一来源，是我銜命出国期間发往国内或由国内发往我国駐外使館以及別国政治家的口授电文初稿。其他的来源还有我随时写下来的一些札記，当时写札記的目的在于以之作为日后有机会时作更詳細的記述的依据。所有这些当时記錄下来的关于当时的行动的

全部想法。

我认为这样的記述或許是有用的，因为，尽管国际政治所表現的形式可能有所变化，而且由外表看来时而松弛，时而緊張，但是人們需要吸取閱历丰富的人的經驗教訓，这一点是确定不移的。

安东尼·艾登

1959年9月于威耳特郡，

普尤西，法伊費耳德

致 謝

我願在此对艾伦·霍奇先生和布莱·卡特利季先生表示谢意，他们分别帮助我准备了本书第二、三两卷和第一卷。弗尔諾勋爵和布·伍·斯科特夫人帮助我准备了第一卷中的若干章，并此志谢。我感谢罗伯特·布莱克先生在本书编写的许多阶段中提出了全面和具体的意见。承我的秘书爱德华兹女士打出了全书底稿，使之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引用的官方文件皆属皇家版权所有，该版权根据法律由女王陛下出版局掌管，我对于能够获准使用这些文件不胜感激。

目 录

前 言

致 謝

第一卷 担任外交大臣时期	1
第一章 接掌外交部(1951年10月至11月)	1
第二章 朝鮮停火(1951年10月至1953年7月)	15
第三章 欧洲防务集团的周折(1951年10月至 1953年6月)	37
第四章 柏林會議(1953年6月至1954年2月)	71
第五章 印度支那战争(1951年10月至1954年 4月)	104
第六章 日内瓦會議(1954年4月至7月)	146
第七章 签订巴黎协定(1954年8月至10月)	199
第八章 亚得里亚海外交(1952年9月至1954年 10月)	237
第九章 石油(1951年10月至1955年3月)	257
第十章 尼罗河(1951年10月至1954年10月)	303
第二卷 担任首相时期	355
第一章 出任首相(1955年4月)	355
第二章 最初三个月(1955年4月至6月)	372
第三章 外交上的准备工作(1955年3月至7月)	390

第四章	最高級會議(1955年7月)·····	401
第五章	繁榮帶來的災難(1955年7月至1956年 7月)·····	426
第六章	訪問華盛頓(1956年2月)·····	450
第七章	約旦(1956年3月)·····	469
第八章	布尔加宁和赫魯曉夫訪問英國(1956年 4月)·····	488
第九章	國防(1955年至1956年)·····	507
第十章	殖民主義與馬耳他(1955年至1956年)·····	526
第十一章	塞浦路斯(1955年至1956年)·····	544
第三卷	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	575
第一章	盜竊行為(1956年7月19日至8月2日)·····	575
第二章	十八國建議(8月2日至23日)·····	607
第三章	孟席斯代表團(8月23日至9月9日)·····	625
第四章	蘇伊士運河使用國協會(9月10日至 17日)·····	653
第五章	聯合國(9月19日至10月13日)·····	673
第六章	前奏(10月13日至23日)·····	699
第七章	衝突(10月23日至31日)·····	720
第八章	戰鬥(10月31日至11月7日)·····	746
第九章	目光如豆(1956年11月7日至1957年 1月18日)·····	774

第 一 卷

担任外交大臣时期

第 一 章

接掌外交部

1951年10月至11月

盟国团结的终止——俄国的目的
——貝文在外交部——美国与欧洲——
馬歇尔援助计划——柏林空运——共产
主义在中国——亚非民族主义——我就
任外交大臣

我的政治生涯从战争中开始。它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也是在战争准备时期和战后的余殃里度过的。因此，我对于如何在第二次大战后的年代里建立国际秩序的信心，已由于我的经历而大为减弱。那些意识到苏联野心的人们也同样感到信心不足。大家对于建立国际秩序所怀的希望还是照样热切，但较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更为审慎了。

1945年春，我率领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包括艾德礼、哈里法克斯和索耳兹伯里的英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

在斯退丁紐斯率領下的美国代表团全心全意地和我們合作；我們還得到如史末資、麦肯齐·金氏等英联邦成員国政治家的支持。可是，在我們制訂联合国宪章的工作將近結束时，艾德礼和我要回去参加英国大选，当时，我对欧洲事态的演变，越来越有一种預感。在會議期間，由于俄国人的情緒和做法日益令人不安，首相和我曾經在电报中交換了对前途的看法。

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看，有足够的理由說明为什么俄国在和平时期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必須作我們的盟国。三次战争，即拿破侖战争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証明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头两次战争結束以后，紧跟着我們就疏远了，結果对两国都沒有好处。上次大战接近結束时，当时苏联工会主席即后来任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的什維尔尼克应我的邀請，出席外交部的一次午宴。我曾經和他談到這個問題，建議我們应当避免重复过去的錯誤。看来他似乎是出于誠意地很想同意我的意見，而且無疑地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我的意見。但是由于意識形态和苏联的野心从中作梗，所以盟国之間的战时團結，一到和平时期就破裂了。

有一个因素本来可以使我們團結起来的，那就是防止德国永远不再威胁和平的决心。由于法国被占領，而美国可能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当时这个决心原可以成为一种足够有力的推动力量。但是希特勒最后的疯狂行为給德国带来彻底毁灭。俄国认为沒有必要再到西方寻

求盟国，更不必为此而付出代价，虽然它随时都会接受顺从它的国家作它的盟国。

对共产党人来说，停火只是一个休整的时机，战争在他们看来只是前进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苏联人不曾为战争所阻止，他们也不会因战争而暂时停顿，他们从来不怀疑他们的信心。正是这种不能自己的机械行动(automatism)使西方感到为难，西方还不知道怎样来对付和克服它。在苏联人的心目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只是时间和时机的問題，对此他们随时准备予以打击。

早在波茨坦协定之前，就有要发生麻烦问题的迹象。莫斯科拒绝成立一个民主代議制的波兰政府，而且无情地强迫他们的波兰傀儡政府向西方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我本来希望早在战争尚未結束前就提出波兰問題，并且在我 1943 年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先生一起訪問莫斯科期間曾經要求和他一起共同表明我们的态度。我尽量鼓励他在这个問題上和我們协作，但是，虽然我們之間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坚决地认为他无权采取这一行动。也許这种不情願并不象我当时所想的有那么重大的关系。即使在最初就取得完全一致的協議，苏联人在胜利的时刻也还是不大会注意这些協議的。俄国人当时过于重視他們的实力，以致不会把任何遏制放在眼里，除非是遇到更大的力量。十一年后，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行为依然沒有改变。

1945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以后，有一天我到白金汉宫去交卸职务，曾在那里的一间邻室中同欧内斯特·貝文进行过简短的交谈。他刚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我想这件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举行交印受印仪式的间隙中，我们匆促地讨论了一下我们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俄国和波兰的要求所采取的实际立场。我向他再次说明他已经知道的事情：我极力反对那种同意对波兰人作任何让步、让他们越过奥得河和东尼斯河这条线的主张。貝文听了我的意见，然后说他将尽力而为；以后他果真这样作了，但是他没有成功。

欧内斯特·貝文和我在战时内阁共事的年代里相处得很好，我们常常一道讨论外交事务。那时，我对他比对工党中的其他成员更亲密一些，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始终不渝，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1945至1950年这一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是受他的个性所支配的，这种情形对英国和欧洲都有利。

貝文为人精明，他不久就发现他在任职期间的问题就是如何反抗苏联的越来越大的欲望。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对于这种新的危险毫不警惕，因此，这就需要有一个才气焕发和笃信不移的人，首先自己了解这种危险的程度，然后又领导他的同胞去认识他所作的判断。貝文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他值得人们久久难忘的一点。他的主要困难在于他那个党，因为在他担任外交大臣的整个期间，工党内总有少数积极活动的人对他的政策表示冷淡，

甚至反对。幸而貝文在工党内，尤其是在职工运动中都很很有威信，能够压住批評他的人。

我最后一次看見貝文是在下院里，那时候他已經辞了职。他对这件事感到很不痛快，并且表示憤慨。他对我讲了事情的經過，我也很同情他，但是他病得很厉害，已經不能担負公职的重担了，却仍然非常勇敢而不願承认这一点。貝文是有才干的。在他知道他的工作已經結束，他的体力显然逐渐衰退的那一天，我比过去什么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他是有才干的。

虽然我处理某些事情的方式可能和他有所不同，但是我对他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和他所作的許多事情却很同意，我們是經常見面的。他常常請我到他在下院的办公室去，对一些大事作一番非正式討論。我在議会的辯論里接着他发言，要不是我真想少让他为难的話，我一定更多地公开同意他的意見。

在工党执政初期，斯坦萊先生在下院評論我国外交政策的連續性时，曾提到貝文先生在关于联合国宪章的一次辯論中的发言。斯坦萊說：

“我們在大选中，从反对党諸位議員的竞选演說中知道：他們重掌政权将会創造一个新的世界……呃，現在我們已經在新世界里过了两星期，当然在这新世界中仍然有一些我們听慣了的发言。正是那位可敬的外交大臣先生，在星期一发表的博得整个下院喝采的冠冕堂皇的发言使我奇怪，他在空余時間——如果他現在真有任何空